

## 【论 文】

# 壮族分类体系与认同变迁的再思考

——兼评《Creating the Zhuang: Ethnic Politics in China》<sup>1</sup>

卢 露<sup>2</sup>

*Creating the Zhuang: Ethnic Politics in China*（《创造壮族——中国的族群政治》），是美国学者白荷婷（Katherine Palmer Kaup）基于长期的田野调查而出版的一本专著，该书结合了翔实的文献资料来分析广西和云南的壮族认同，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政府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建构、制度设计和相关政策进行了系统的考察，近十年来对壮族和中国民族政策研究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该书的基础是作者在1995年到中国做调查后于1997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经1998年修改后，2000年在美国正式出版。此书出版后，国外的学术界有4家杂志作了评价：“一是《美国政治协会》杂志作了大力推荐，认为壮族有自己的民族特点，是个真实存在的少数民族；二是英国出版的《中国季刊》发表的澳大利亚世界民族研究专家玛卡拉斯教授的文章《介绍〈创造壮族〉一书》，给了作者很高的评价。而在2000年以前，在一般美国公众的眼里，中国的‘壮族’是早已被汉化的少数民族”<sup>3</sup>。

国内也有学者对这本书进行了回应，广西学者李富强认为：“白荷婷的这种观点其实是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下民族主义研究的一种观点。……在族群和民族主义研究上，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否定民族原生论（该理论认为，民族认同或民族行来自于具有共同世系或共同文化的根基性情感联系），认为族群和民族在本质上都是场景性的存在，具有政治上的工具性。所以，20世纪70年代之后，族群认同理论中的情景论（Circumstantialist）或工具论（Instrumentalist）取代了族群原生论（Primordialist），成为主导理论。该理论认为民族认同或民族行是在一定社会背景中为了群体利益的实践活动的产物。白荷婷的‘共产党创造壮族’的观点可以说是族群情景论或工具论在壮族研究的反映”<sup>4</sup>。他总结到，壮族的形成及认同是在历史中形成的，而不是共产党创造的产物，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确定了壮族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为壮族的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

### 一、 全书的研究问题及理论视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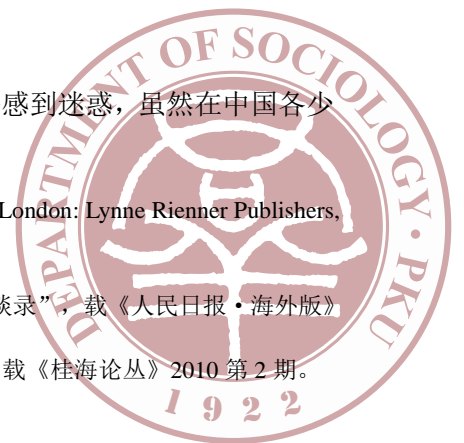
作为对中国少数民族感兴趣的一名西方学者，壮族多少让白荷婷感到迷惑，虽然在中国各少

<sup>1</sup> Kaup, Katherine Palmer. *Creating the Zhuang: Ethnic Politics in China*. Boulder &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2000.

<sup>2</sup> 作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09级博士生。

<sup>3</sup> 吴薇、王明富，2001，“美国教授看壮族——美国富尔曼大学副教授白荷婷访谈录”，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年12月19日第5版。

<sup>4</sup> 李富强，2010，“壮族是创造的吗？——与西方学者 K. Palmer Kaup 等对话”，载《桂海论丛》2010年第2期。



数民族当中人口规模最大，有自己的自治区，但是民族特点却不突出。那么“究竟谁是这些神秘的壮族？或者一直如中国共产党和壮族积极分子宣称的那样他们事实上是‘一个有着丰富历史和文化传统的独特民族’？或者他们仅仅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言的，纯粹是中国共产党在现代人为构建的产物？换言之，他们真的异于汉族吗？”<sup>1</sup>带着这样的疑问，白荷婷数次来到中国的广西和云南等地进行田野考察，对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实行新的民族政策以来，壮族内部各阶层民众的认同转变进行了分析。而作者更为深入关心的问题则是“在共产党执政的前夕，壮族内部互动的性质是什么？是什么因素限制了他们把自己动员成为一个民族的能力？在1949年以后，又是什么因素最能解释壮族群意识的明显提升？这种族群行为的上升是否仅仅归因于中国政府的作用？那些最流行的关于民族起源的理论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壮族吗？反之，关于壮族的研究将能够告诉我们有关更宏观的族群认同和族群政治动员的理论吗？”<sup>2</sup>

因为在民国政府时期，在广西执政的桂系地方政权并没有将“壮”（1965年以前称“僮”）单独视为一个民族，当时也没有“民族”的概念，只有僮人、苗人和瑶人等称谓。新桂系领袖基本认同和接受当时主流的“五族共和观”以及后来的“中华民族观”，与此相对应，他们把苗人、瑶人和部分仍未开化的僮人视为“特种部族”，所以在他们的执政方针中，有专门针对这部分群体而进行的特种部族教育和文明开化运动。白荷婷在书中也提到了这一点，即当时的新桂系将领白崇禧认为僮人已大部分同化于汉人之中。在早期西方学者的研究中，也认为僮人与汉人基本已无太大差别。

接下来，白荷婷就民族的定义和研究民族的四种理论范式进行了梳理。作者指出学者们常使用各种相关的术语，如族群（ethnic）、族群性（ethnicity）、共同体（communality）、民族性（nationality）、民族（nation）和国家（state），几乎所有的学者都会采用这些术语来解释民族性（nationality）形成的相似进程，但有时却又把这些词的内涵弄得含混不清。学界对于一些重要的主观标准（诸如群体意识和自我认同等）以及客观标准（诸如语言和服饰等）并没有达成相对一致的共识。例如 Ernest Renan 的观点是典型的主观定义，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四个标准则被视为客观定义的代表。“民族就是每天的公民投票，而在他们停止认为自己是一个民族的那刻，这个民族就不存在了……这两种理解民族的途径隐含着的局限性是一种明显地反对另一种”<sup>3</sup>。所以，后来的学者都希望能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鸿沟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白荷婷列举了在这方面较具代表性的学者，主要有 Walker Connor, Paul Brass, Karl Deutsch 等人，这些学者观点的共同点在于“族群的定义是以客观的文化准则，并涉及到主观的族群意识，一旦这些族群为了管理自己的成员开始有了共同的政治要求，他们就形成了民族”<sup>4</sup>。

作者进一步总结到，理解民族形成的四种研究范式主要有：原生性的（primordial）、工具性的（instrumental）、结构性的（structural）和支配性的（hegemonic），大部分学者在研究都会运用两种以上的视角来分析。然而，很少有人能指出这四种范式间的相对影响，他们都忽视了族群间的关系会随着时间推移，随着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的变迁而发生变化。

白荷婷认为，在中国经验中，壮族为民族识别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在民族识别以前，壮族并未意识到本身是一个独特的、有边界的民族。如果用以上四种范式去理解壮族建构的复杂性，那么，在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最初十年，中央政府的支配性目标决定了其对壮族的民族政策，

<sup>1</sup> Kaup, Katherine Palmer. *Creating the Zhuang: Ethnic Politics in China*. Boulder &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2000. p3.

<sup>2</sup> Ibid. p5.

<sup>3</sup> Ibid. p4.

<sup>4</sup> Ibid. p16.



国家利用壮族原生性的情感和忠诚去说服壮族，他们需要一个在共产党统治下的“自治政府”来管理本族事务。在 1979 年教育和经济体制发生结构性变化后，壮族精英又被国家民族政策动员起来去实现工具性的目标。

## 二、全书的结构和主要内容：

### （一）土著还是移民？——学术界关于壮族起源的三种观点

在许多西方学者的眼中，壮族是一个在文化上较早接受中原文明，已被汉化的少数民族。但是，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人口分布格局以及自给自足的经济条件等原因，白荷婷认为壮族实际上并没有融入到一个更广阔的“民族-国家”体系中，他们自身在历史上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

关于壮族的起源和构成，大致有三种说法：一种认为壮族是由外省移民迁入广西而形成；一种认为壮族是土著居民，百越民族的后裔；还有一种认为壮族是外来移民与本地居民通婚融合发展而来的。这三种说法被壮族内部不同层次的群体所接受，也体现了壮族群体认同的多面性。白荷婷从几个方面阐释了她的观点：首先，广西西南部与云南东部多丘陵的地理环境使得壮族内部各群体的生存环境相对隔绝，并形成了大量的方言，也制约统一文字的产生。所以，壮族的语言特点不仅为其融入中华民族设置了一系列障碍，也限制了壮族各支系融合形成一个单一民族。根据语言学家的分类，壮语被划为汉藏语系中的侗傣语族，壮语有北部和南部方言的区别，其中北部方言有 8 种，南部方言有 5 种。尽管学者们对于南北方言的差异性具有不同的认识，但是在实践中，地区间语言造成的障碍（包括对汉语的掌握程度），明确限制了壮族内部的融合以及壮族与汉族的融合。

其次，传统中原王朝的治理方式对广西的统治有限，“中央政府通过羁縻制度和土司制度维持着对广西名义上的控制，他们要求当地首领对中原王朝的统治者表示忠诚，但并不指明他们如何去治理他们独立的地域。土司制度始于唐朝，但土司们对赋予他们权力的中原统治者却没有感情，常常以起义来对抗中央的控制”<sup>1</sup>。虽然中央政府较早地对广西地区进行了“改土归流”，但一直到 20 世纪初，土司及其后代的影响力还一直存在。白荷婷还指出，“壮族各支系的不同还进一步地限制了壮族的融合。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前夕，壮族各支系的成员对政府分类的‘支系’的感情要远远超过他们对更大的‘壮族’的认同”<sup>2</sup>。同时，她还比较了云南和广西的情况，在云南的壮族有侬、沙、土三个主要的支系，与广西壮族不同，他们很少自称为壮族，而称自己为某支系的成员。但是在广西，为了增进壮族内部的团结，支系这个提法已很少被大众媒体提及。最后，作者指出“不像藏族或穆斯林民族那样，壮族没有统一的宗教，这更进一步阻碍了他们成为一个单一的民族。许多壮族的村庄共享着多神崇拜的仪式，但他们没有一个共同的神，也没有一个有体系的宗教领导层来将不同的村庄联系起来”<sup>3</sup>。

### （二）为何决定识别壮族？——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政策的理论来源

在第三章中，白荷婷提出了这样一个研究问题：是什么原因促使中国共产党为壮族设立了一个省级的自治地区？她首先总结了西方研究者的几种观点：第一种看法以 G.F. 哈德森为代表，认为“中国共产党赋予壮族自治区是为混淆新疆、西藏和蒙古的议题。他写到，在北京方面的讨论中，认为适合壮族的就一定适合维吾尔人、西藏人和蒙古人”<sup>4</sup>。第二种观点以乔治·莫舍和

<sup>1</sup> Ibid. p35.

<sup>2</sup> Ibid. p35.

<sup>3</sup> Ibid. p43.

<sup>4</sup> Ibid. p51



蒂娜·拉瑞为代表，他们认为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政治目的只有一个，即将壮族作为统治的同盟军来打击当地汉族的地方分裂势力。白荷婷认为，这些学者错误地以为壮族和汉族没有差别，才得出相应的结论，并认为中央政府隐藏了创造和发展壮族群认同意识的动机，这与壮族内部情况没有关系。“尽管壮族没有正式的族群组织，几乎没有族群意识，因而不可能向中央政府提出协调一致的政治要求，但仍然需要一些特殊的政策来将他们融进更大的国家（Chinese state）当中，哈德森、莫舍里和拉瑞都没有意识到这一关键的事实”<sup>1</sup>。白荷婷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的民族政策以及政策的理论来源。“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民族政策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纲领发展而来。最初，苏联的民族政策以及中国传统观念中哪些群体构成民族（unique nationalities）的观点都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在遇到西南地区不同支系的群体时，不得被迫进行调整。”<sup>2</sup>

### 1、民国时期国内外政治局势，以及国民党对少数民族定位的影响

作者在书中系统回顾了中华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制定的少数民族政策，由于国际和国内因素的影响，国民党把大部分精力都集中在有独立诉求、且英法等势力不断渗透的西藏、蒙古、新疆等西部和西北部地区。而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只要不公开反对中央，国民政府就不会觉得有必要将西南少数民族完全充分地整合进国家体系中。这样，地方的行政控制权就掌握在地方军阀和他们的继任者手中，只要这些将领保持归顺就可被接受，而不论其是否直接对中央政府负责。西北和西南根本性的不同至少来自五方面的政治影响：第一，从人口学意义上讲，西北部少数民族在地理上明显与汉族居住区隔离开来，而西南的少数民族（特别云南、广西）与汉族常常杂居或相邻而居。第二，西北各少数民族有各自统一的宗教及宗教领袖，这提供了与中央政府抗衡的实力，而西南各少数民族不具备这一点。第三，西北各少数民族内部语言比较统一，而且有自己的文字，而西南各少数民族的语言系统往往由支离破碎的许多方言组成，并且没有形成统一文字。第四，西北主要各少数民族，包括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在中国近代上都曾有过的诉求。第五，英、俄、法、日等外国势力的介入更彰显了西北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的重要性。

正是基于对当时西北和西南少数民族不同特点和局面的认知，中华民国的国民党在处理少数民族问题上采取了不同的思路。从孙中山的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论到蒋介石的“中华宗支论”，在国民政府有关少数民族的政策文件中，“只有西北的族群和被名为‘tribes’（部落）的西南群体。当然，壮并没有被承认为一个民族（nationality），国民党在其关于少数民族的文件中也从未提到‘壮族’”<sup>3</sup>。在当时桂系主要将领和一些广西学者的观念里，壮人已同化于汉人或者与汉人的差别已不大，他们只有“特种民族”的概念，即指深居桂北山区中瑶、苗、甚至包括一部分“生壮”。而且，当时国民党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判断和相关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民族观。

### 2、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和苏联模式的影响

“早期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以苏联为模式，以马列主义民族理论为基础的……马克思最早并未讨论民族主义，最主要的原因他认为随着共产主义革命的发展，民族性的情感（national sentiment）将会消亡”<sup>4</sup>。苏联接受了马克思关于民族的描述，将民族视为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并随着共产主义革命取得胜利而消亡。

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民族政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苏联共产党的努力将会使得几个世纪以来俄沙皇时代的民族压迫消亡。其次，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承认少数民族发展自己语言、文化的权利将有利于消除少数民族和俄罗斯人之间的差距，

<sup>1</sup> Ibid. p51.

<sup>2</sup> Ibid. p53.

<sup>3</sup> Ibid. p61.

<sup>4</sup> Ibid. p63.



并使各族最后一起加入到共产主义事业当中。第三，在苏联早期巩固一体化的过程中，还实行了本土化（korenizatsiia, or indigenization）的体制，这种制度用当地族群干部来取代许多俄罗斯族官员，为了能更好地推进共产主义的事业，启用当地少数民族干部可以使用本族语言来对本民族成员实施教育。

### 3、中共早期的民族观也是一个不断调整和发展的过程

在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并直接接触到少数民族之前，中共就有了最早民族政策思路和框架，它既反映了马列主义的民族观和苏联模式，也受到了当时国民政府对少数民族的命名和定位影响。但总体来说，二者的政策思路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共产党并不强调要促进少数民族的汉化，而且，中国共产党一直到1938年都在追随苏联模式并公开支持少数民族自决的权利。

中共早期的民族政策深受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情况的影响，并宣布支持蒙古、新疆等地区自决。在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共产党开始把革命工作的重心从城市转入农村，开始接触到西南的少数民族，并意识到深入了解少数民族情况的重要性，但这一时期中共的政策文件几乎没有提到西南民族的。“共产党在江西时期（1928-1934年）与少数民族交往的过程中获得了一些经验，在后来的长征中途经少数民族聚居区又获得了更多的认识”<sup>1</sup>。直到1939年12月，毛泽东发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他在第一章中指出：“我们中国现在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差不多占了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在这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人、苗人、彝人、壮人、仲家（布依族的一种旧称）人、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sup>2</sup>。这也是壮人、仲家、彝人等第一次在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中被提及和承认，肯定了这些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重要性。

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共产党相继在广西领导了百色、龙州起义，建立了左右江根据地。虽然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只存在了一年多时间，但在邓小平和韦拔群等人的领导下，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少数民族的政治纲领，反对歧视苗瑶民，反对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和土豪劣绅的压迫，提倡苗瑶、壮和汉人的平等，对改善当时的广西民族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1934年10月，由于受“左”倾错误影响，中共中央苏区在反围剿中失败，被迫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12月红军长征经过桂西北的兴安等地，前后只有短短的28天时间。并且，中共在过境时发表的两份关于少数民族的文件，主要针对的还是处于被压迫地位的苗族和瑶族。所以，中共对于广西当时的民族关系和状况，还是认识非常有限的。1950年7月21日欢迎赴西南地区的中央民族访问团大会的讲话中，邓小平反复强调了共产党在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工作中缺乏经验，指出解决西南最复杂的又是最重大的问题是一一民族团结。

#### （三）共产党和中央政府权力在广西逐渐巩固的三个时期

在新中国成立一个月后的1949年11月18日，毛泽东主席发布了解放军兵分三路对广西省国民党残部发动进攻的指令。在解放广西后，中共面临的是一个复杂而困难的局面，军事、基础措施的毁坏，经济通货膨胀的失控，大量无家可归的农民，以及此起彼伏的地下反共运动。新生的共产党政权和党的干部们十分缺乏新的工作经验，由于对地方缺乏深入的了解，只能忙于处理各种突发的情况。白荷婷指出，使情况更为恶化的因素是，桂西各少数民族的语言阻碍了汉族干部深入地去宣传党的目标。在广西的权力尚未巩固的情况下，是很难进行一系列的社会经济政治改革的。所以，“中国共产党努力想巩固其对将近1600万人的壮族群的治理，而正式地认定他们为‘壮’，这一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见表4.1）”。

<sup>1</sup> Ibid. p63.

<sup>2</sup> 毛泽东，1939，《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选自《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2页。



表 4.1 壮族与国家政治互动的各个时期

第一阶段：中央政权的巩固，1949-1966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成立	
1949-1952 年	发现壮族 (discovering)
1952-1956 年	定义壮族 (defining)
1956-1958 年	提升壮族 (promoting)
1958-1966 年	治理壮族 (administering)
第二阶段：混乱和文革，1966-1978 年	
第三阶段：区域自治的扩展和中层壮族积极分子行动的提升，1978 年至今	
1978-1984 年	集中对文革进行直接的补偿
1984-1990 年	推广分权
1988 年至今	中层壮族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积极行动主义 (activism)

“尽管中国政府强调从公元前 202 年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中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但过去两千多年中国政治的特点是，此起彼伏的起义不断挑战中央薄弱的统治。分散在各地区的族群运动在近现代逐渐高涨，从 1850 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开始，直到旧桂系时期（1916-1927 年）达到高峰”<sup>1</sup>。

1951 年，中央政府派出以李德全为团长、费孝通为副团长的民族工作队到广西调研，当时的报告显示，广西有 600 多万被称为“土人”的群体身份意识非常模糊，他们自称为讲“壮话的汉人”，且分布非常广泛。“广西有一种人自称为土人，或本地人，分布很广，除了东南角靠近广东的 10 多个县外，没有一个县没有土人”<sup>2</sup>。1952 年 12 月，中央决定成立桂西壮族自治州，并宣布把加强民族团结作为州政府的主要任务。与此同时，从 1952 年至 1956 年，中央政府开始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工作，除了国内许多优秀的语言学家、民族学家和历史学家外，也有苏联专家的参与。1958 年 3 月 8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在此之前，中共开始了培养壮族干部，提高壮族地位，给予壮族优惠政策等准备工作。白荷婷认为，这一时期并没有材料和证据显示壮族主动要求成立自治区，表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成立是始终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

“壮族最初被承认并被赋予自治区是为了整合他们进入统一的中国政治体系里。一旦这一目标在毛时代末期已实现，中央政府对构建壮族团结和自豪感的兴趣开始减退，但是对壮族原生性的认识以及建立壮族祖居地 (territorial Zhuang homeland)，刺激了壮族干部为本族群争取特权。到 20 世纪 80 年代，给予壮族特权的政策不再是自上而下的了，由中央政府提拔的壮族中层干部，现在被动员起来为他们的民族 (nationality) 要求更多的族群权力 (ethnic rights)”<sup>3</sup>。

由于马列民族观和苏联模式的影响，中共在反思“大汉族主义”的同时，也从政治、经济到文化赋予了少数民族发展的权利。从落后、被压迫到各民族身份地位的平等，壮族作为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却因支系众多并没有统一的认同感，而且由于较早就纳入中原王朝的管理体系，以及历史上几次外省移民的融入，现代壮族群中相当一部分有着强烈的中原认同。面对这样一个支系复杂、人口众多而认同多元的族群，如何提高其对本族群的自豪感和文化的自信力，是早期

<sup>1</sup> Kaup, Katherine Palmer. *Creating the Zhuang: Ethnic Politics in China*. Boulder &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2000. pp75-76.

<sup>2</sup> 费孝通，1951，“关于广西壮族历史的初步推考”，载《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新编》（上卷），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第 90 页。

<sup>3</sup> Kaup, Katherine Palmer. *Creating the Zhuang: Ethnic Politics in China*. Boulder &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2000. p76.



中央政府对壮族政策的重要内容。白荷婷在书中也对壮族社会的一些政策和现象做出了解构。“我们是中国最大的少数民族，也许也是唯一没有英雄的民族。为了增进壮族内部的统一，强调壮族在历史上就与‘汉族老大哥’合作，建立壮族的自豪感，中共在 1952 年起就开始塑造壮族英雄。一系列壮族地区历史上、神话里的人物形象被塑造成为‘壮族’（Zhuang nationality）对祖国伟大贡献象征。”<sup>1</sup>。也许韦拔群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在他的家乡东兰，由于长期的交往和族际通婚等原因，壮族和汉族在经济状况、身份地位上差别不大。但是相比较而言，瑶族在经济、社会地位各方面都处于劣势。从当时邓小平、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农民运动的目标以及颁布的政治纲领看出，瑶民问题实际上才是当时最为关注的重点。

#### （四）地方自治权的扩大和壮族行动主义（activism）的提升

文革期间，中央开始强调民族问题的阶级性，保护少数民族风俗和文化都不再被鼓励。其实从 1957 年的反右运动开始，由于受到苏联和斯大林民族观的影响，中共以及当时学者对于民族的认知模式都更强调其阶级对立的一面。在反思所谓的“大汉族主义”的同时，也在批判“地方沙文主义”和“分裂主义”。在十年“文革”的动乱时期里，广西的少数民族工作几乎陷于瘫痪和停滞，民族事务委员会被迫取消，民族研究所也被关闭，有关壮族的语言和文化的出版物发行量也减少了许多。然而，文革中开展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却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壮族的意识得到了提升而非下降。“大批的汉族知识分子在‘下乡’运动中被送到偏远的壮族农村，这时农村的土地已非常稀少，当地人又说着难懂的方言，民族文化在文革中被视为落后而不是被颂扬。而被下放的许多汉族知识分子因不懂得农业生产技术，被当地农民视为软弱和笨拙。当壮族和汉族进一步接触并意识到彼此的不同时，壮族的意识似乎开始提升。”<sup>2</sup>。

经过近十年的中断后，全国的少数民族工作又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该书的第五章，作者集中探讨了文革后广西区域自治权的扩大，以及壮族知识分子族群意识的提高。白荷婷总结到，为了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极端做法，“新时期”最初十年的民族工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共产党早期民族的目标已基本实现，即把少数民族整合到统一的中央体系中。文革结束后，中央决定重新开展和进一步推动民族识别工作，调查一些五、六十年代尚未识别或未划定成分的民族。第二，党和中央政府认为，为了区别“汉族沙文主义”和“地方分裂主义”，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必须得到更清楚的立法。这种倾向以 1984 年颁布的《民族区域自治法》为顶点。第三，1979 年后中央政府开始强调汉族与非汉族要有经济上的平等权，而不仅仅政治上的平等，即所谓去除“事实上的不平等”（actual inequality）。

20 世纪 80 年代，在中央政府努力提高区域自治的同时，还进行着一场政府的分权运动，主要为了区分党和政府部门不同职能，通过分权使党从政府的日常事务中脱身。白荷婷认为“这两项政策极大地增强了壮族在政治上的自治。但是尽管在 80 年代壮族在政治上的自治，以及在政府官员中本民族代表的比例增加了，他们的经济地位相对于其他少数民族来说却开始降低”<sup>3</sup>。由于逐步提升政治地位和经济发展滞后的矛盾，这进一步刺激了壮族中层干部和学者向政府提出更多有利于本民族的要求。白荷婷采访到的一些壮族精英认为，经济特区法使特区的本地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而《民族区域自治法》并没有使得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获得更好的发展。所以，虽然在新时期，党和中央政府强调使少数民族获得经济上的发展，以达到事实上的平等，但实际的效果却是政治上的目标实现了，经济上的差距却进一步拉大，这反而进一步刺激了壮族精英们从 90 年代起争取更多权利。

在书中的第六章，白荷婷通过实地的考察，探讨在制度政策发生变化后，壮族地区的政治自

<sup>1</sup> Ibid. p94.

<sup>2</sup> Ibid. p106.

<sup>3</sup> Ibid. p112.



治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所获得的显著提升，以及壮族在文化和教育领域的新变化。“中央政府通过多种渠道的资源去发掘历史资料和文学，提高壮族地区的教育水平，以及保护壮族语言。这三方面的政策是由政府推动的。国家政策的影响是显著的，对壮族不同层次的影响也不同。研究每个不同的政策领域，可以发现，党的文化政策对壮族农民和中层干部、知识分子有着根本性的不同”<sup>1</sup>。

在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广西省的教育水平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五十年来，通过特殊的教育政策和优惠条件，广西地区的少数民族干部人数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壮族普通民众的总体教育水平尽管比汉族要低，但却比历史上有了极大的提高。除了消除文盲、普及教育，党和中央政府还在广西地区创造壮文，发掘壮族史料和文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政府的公立学校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干部、教师和学生比接受普通教育体系的人具有更强的（壮族）民族认同意识。壮族的干部、学生不断告诉我，在进入民族学院学习和加入党委开办的中等教育培训机构以及民委机关之前，他们对壮族的事物不感兴趣。”<sup>2</sup>为什么中国最大的少数民族一度对自己的历史漠不关心？为什么壮族学生、农民其实并不愿意学习壮文，却把壮文树立为壮民族主义的象征？这些确实是令壮族知识分子感到尴尬而窘困的问题。

#### （五）自由地变穷？——我国民族制度设计的局限性

在该书的最后两章，作者继续深入探讨了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广西地区经济发展和壮族族群民族主义（Zhuang Ethnic Nationalism）的关系。正如前面所提到，广西地区的经济和教育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与全国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这又进一步刺激了壮族精英们自 90 年代起努力争取更多权利。在壮族的知识分子中有这样一种观念：“尽管少数民族地区可以在事实上全面履行他们的自治权利（事实上他们不能），实际上他们没有获得提供给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那样的优先政策。结果是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等和少数民族的不平等进一步拉大，东部地区获得了更快的发展，而少数民族地区却像被越勒越紧的缰绳一样更加落后。……少数民族地区应该获得比一般地区更多的自治权利（emphasis added）”<sup>3</sup>。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广西的经济和教育在获得发展同时，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相比，差距却进一步拉大。正如许多壮族官员抱怨的现在他们只能“自由地变穷”（free to be poor）。

那么，壮族的族群民族主义（Zhuang Ethnic Nationalism）到底是会继续上升还是会下降？这种民族主义在多大程度上能对中国的国家统一构成挑战和威胁？白荷婷从两个方面切入来进行探讨，首先，与苏联的情况相比，许多分析家并没有预测到苏联的快速解体，作者虽然没有深入对比中苏两国的体制，但指出了几点不同。因为乌克兰、白俄罗斯等联邦进入苏联体制是由于武力征服，并且苏联宪法给予了每个联邦退出的权利。另外，苏联的非俄罗斯人口占总人口的 48% 以上，而中国的汉族人口远高于这个比例。而且除西藏以外，几个自治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在区总人口中都达不到半数。在西南边疆，许多少数民族和汉族间的居住格局呈现的是“大杂居，小聚居”的状态，族群之间的交往和通婚非常密切。其次，壮族内部缺乏统一，现代壮族不仅支系众多，且广西壮族和云南壮族间也缺乏认同和交流。所以，白荷婷认为壮族要被进一步动员起来还有许多的阻碍，但是面对差距越来越大的经济和教育状况，提出进一步利益要求的干部、知识分子都是在党的民族教育体制中培养出来的。“我遇到的许多壮族都为他们的族群性（ethnicity）感到骄傲，并通过许多方式非常仔细地指出壮族是独特的民族。但我仍认为，壮族缺乏‘共同体利益意识’（interest group consciousness）……中国共产党为了促进国家的整合而冒险创造了一个最大的民族，但是这个风险是有代价的。”<sup>4</sup>

<sup>1</sup> Ibid. p125.

<sup>2</sup> Ibid. pp137-139.

<sup>3</sup> Ibid. p167.

<sup>4</sup> Ibid. p178.





### 三、讨论：中、西方学界在西南民族研究范式上的差异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郝瑞、白荷婷、李瑞福为代表的研究西南地区族群的美国学者们，从“边缘”概念出发来研究中国，他们更为关注的是各民族之间的差异性，与中国学者强调民族的历史性、变动性和文化多元的面向不同，他们更倾向将中国视为一种“族群马赛克”（ethnic mosaic）式的拼图景象。所以，西方学者在中国从事民族研究和讨论我国民族政策的时候，不免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这种有失偏颇的研究视角，在他们对中国民族问题做出评价时也难免有不妥之处。

由于受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作《想象的共同体》的影响，美国学者们的中国民族研究，主要考察国家政策在与基层社会整合过程中所遇到的认同问题，并对其具有后现代色彩的解构。族群（ethnic group）与族群性（ethnicity）的研究在西方学界的兴起，是与北美国家与东南亚地区的族群冲突与认同问题日益凸显的背景相联系的。“他们在‘边缘’、‘欠发达’的地区中，寻找弱势群体在摆脱霸权、寻求解放与自主等抗争性实践活动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这些受政治经济学派影响的学者们所关怀的东西，可以说是他们在研究中的一种预设目标”<sup>1</sup>。美国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正受政治经济学派的广泛影响，与此同时，逐渐兴盛的后殖民理论也影响着美国学者的学术立场与关怀。

#### （一）“民族”定义和术语的使用含混不清

虽然在该书一开头，白荷婷试图梳理族群（ethnic）、族群性（ethnicity）、共同体（communality）、民族性（nationality）、民族（nation）和阶层（state）等容易含混不清的定义，以及理解民族形成的四种理论，即原生性的（primordial）、工具性的（instrumental）、结构性的（structural）和支配性的（hegemonic）。她亦指出在学界中关于主观标准的群体意识和自我认同等，以及客观标准的语言和服饰等难以达成共识，研究民族的四种理论范式亦会随着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的变迁而发生变化。但是，在作者使用这些概念和范式时亦不可避免的陷入某种含混不清的境地。之所以难以避免这些歧义，既反映了西方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工作现实之间的隔膜；也反映了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民族理论框架的难以调和之处。正如该书简介中所言“这项前沿研究揭示了壮族独特的文化，同时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为整合中国族群马赛克（ethnic mosaic）之间的差异性，以及平衡族群和地方之间的忠诚，在过去50年中所采用的治理技术。”<sup>2</sup>西方学者更强调建国以来56个民族的客观性、他者性和差异性。作者试图在国家、族群层面以及主、客观等不同语境下使用“民族”术语，诸如Zhuang ethnic consciousness、Zhuang ethno nationalism、Zhuang people、Zhuang nationality、Zhuang ethnic nationalism。现代壮族本身具有多元性的特点，作者在使用这些词汇的时候，更着眼于在宏大叙事下对国家话语与权力结构进行分析，但这种泛化也不可避免的抹煞了一些差异性。虽然近十几年来，西方学者的研究范式和结论也在逐步修正，但始终难以避免中西文化差异的问题。

#### （二）“中心——边缘”、“国家——精英”等二元对立的理论框架

在白荷婷的著作中，始终把“汉族”与“壮族”（Nan and no-Han）假定为两个对立的主体，这影响了她理解二者在历史上的关系，首先，壮族人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对中原文化有强烈的认同感，日本学者松本光太郎曾提出了壮族“汉人后裔意识”的说法，他指出，“在广西地区岑、莫、许、黄、赵、李等土官家谱中都载明祖先是外省人、汉人，而且这些说法在《宋史》、《文献通考》

<sup>1</sup> 彭文斌、汤芸、张原，“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人类学界的中国西南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1期。

<sup>2</sup> Kaup, Katherine Palmer. *Creating the Zhuang: Ethnic Politics in China*. Boulder &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2000. p178.



中都能得到佐证。而除了土官外，民间的家谱和传说也有这种说法，其中比较广泛的是：一是原籍山东白马县（据近年来学者考证，实为河南滑县），随宋朝狄青将军南征依智高而落籍广西；二是一、二百年前从广东迁来的”<sup>1</sup>。虽然这些说法或有家谱流传，部分甚至无家谱可查，真实性有待考察，但“假托汉胄”在广西，确实是从壮族土官到普通老百姓都有存在的现象。

受二元对立视角的限制，白荷婷在探讨传统中原王朝与广西地区关系的时候，尽管带着对边缘地区弱势群体的关怀，但其批判的立场又不免落入工具性交换的套路中。在她的论述里，广西的土司与中央始终处于利益与忠诚的博弈交换中，在中原王朝的压迫下，广西地方的首领们（从依智高、韦银豹到洪秀全）经常起来起义。在土司管辖的领地里，对移居的汉人有诸多限制，来土关系十分紧张。虽然，白荷婷点出了中原王朝对广西传统治理的有限性和不稳定性，这一特质限制了壮族内部的统一和最终融入中华民族当中。但这种推演过程仍不免有些牵强附会，它还是忽视了主体所具有的能动性和多元选择的可能性。

其实，在1949年建国以后，由于国家话语体系对少数民族的定位，使得我们对少数民族的理解总带有边缘、落后的刻板印象，56个民族的关系也常被简化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以社会发展阶段为叙事特征的中国少数民族表述，显然是通过突显少数民族‘落后’的一面，来确立民族大家庭各成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或缺。这又是一个很吊诡（paradoxical）的现象：少数民族通过成为叙事的中心而被边缘化”<sup>2</sup>。50年代启动的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识别，正是在中央政府反思大汉族主义，帮助落后民族当家作主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而今，二元对立的视角依然在制约我们的思维，在壮族等少数民族地区，利用自身特点来发展，常常意味着发掘其原生性的特质，来满足现代人猎奇的思维。

### （三）民国时期的壮族研究和地方史志的缺失

二元对立的视角还限制了白荷婷深入考察民国时期广西内部情况的复杂性。尽管她在书中的第三章讨论了国民党时期广西桂系政府的一些施政措施，也指出了当时特殊的国际环境使得国民党把大部分精力都集中在有独立诉求、英法等国势力不断渗透的西藏、蒙古、新疆等西北部地区。而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只要不公开反对中央政府，国民政府就不会觉得有必要将西南少数民族充分整合入国家体系当中。

但是在白荷婷所收集的资料和讨论中，不仅忽视了广西学者的著作以及地方史志的发掘，也忽视了国民政府与桂系，桂系与中共之间在政治上此消彼长的关系。毕竟，解放后在广西的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识别是在剿匪工作的背景下进行的。并且，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建国后民族政策的实行也并非是一个戏剧性的转折点。2011年刚刚出版的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Nation: Ethnic Classification in Modern China*（《何以达成民族术语的共识：现代中国的族群分类学》），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西方学者们在西南少数民族研究上的固化思维。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系的墨磊宁（Thomas S. Mullaney）通过查阅云南的地方史志和民国时期的档案材料，对民族识别进行学科思想史上的梳理，指出了民族识别过程中迄今尚未被正确理解的一些关键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思了西方学者对中国民族识别中分类学的批评。他指出，“虽然民族识别被长期假定为共产党直接干预的工程，所参与的社会科学家们只扮演了次要的角色，但我的研究证实了民族识别主要是由民族学家和语言学家所操作的”<sup>3</sup>。虽然，作者的结论不是没有可商榷之处，但是他从历史的角度纵深反思民族分类和认同的复杂性值得我们借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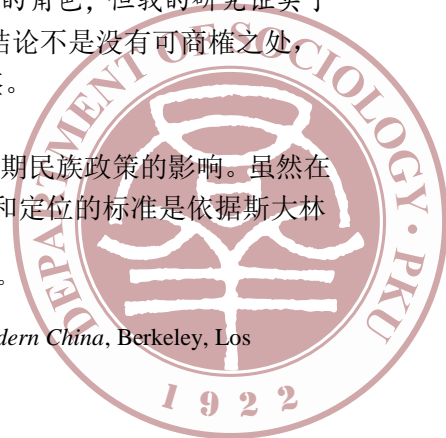
### （四）对壮族分类标准与族群认同变化的探讨不足

白荷婷在著作中，探讨了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和苏联模式对中共早期民族政策的影响。虽然在西方学者眼中，中国的56个民族是由于“国家化”而形成的，分类和定位的标准是依据斯大林

<sup>1</sup> 范宏贵、顾有识，1989，《壮族论稿》，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第115-131页。

<sup>2</sup> 范可，2011，“‘边疆发展’献疑”，《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sup>3</sup> Mullaney, Thomas S.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Nation: Ethnic Classification in Modern China*,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p16.



提出的民族的四个特征。但是，以费孝通和林耀华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强调的还是民族的历史性和继承性。在操作层面上，他们更具体地提出了语言的变动性和“名从主人”原则。而且，民族识别专家的作用，只是为国家制定民族政策以及少数民族对自身的定位提供科学依据。所以，一方面，我们还要仔细探究这些分类原则，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会遇到那些实际的困难，学者们会采取那些变通的方式？另一方面，我们还要考察在 20 世纪 50 年代开展的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识别当中，参与的苏联专家、我国各领域学者所提供的依据在多大程度上能被官方和少数民族自身所接受？

作者还比较了建国后云南文山壮族和广西壮族的变化，在官方的民族识别政策实行四十多年后，云南和广西壮族的认同意识，由于两个省份的政府和新闻媒体在对壮族的定位和宣传上不同，云南壮族的三个支系：侬人、沙人、土人很少称自己为壮族，而保持着自称和对本支系的情感；但广西的壮族对支系的情感已逐渐淡化。这样的变化确实客观存在着，但并不是绝对的，广西壮族支系的情况非常复杂，有些支系情感在官方分类框架和民族政策的主导下，反而由模糊而为清晰了。

广西北部的壮族中有布依支系，在我国的贵州省也有布依族，他们人数众多，特点较之南方的壮族支系有明显差别。那么为什么要把说着同一种语言，风俗习惯相近的，位于红河流域南盘江北岸的人群称为布依族，而南岸的人群称为壮族？在 1952 年第一次人口普查中，各省上报的民族称谓之多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重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必须为少数民族提供席位，因此涉及到名额分配的问题。所以，当时在面临两省行政区划的情况下，壮族和布依族的分类标准是如何变通和取舍的？在白荷婷的壮族研究中缺失了这部分的调查和讨论，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 四、余论：平等与二元——我国民族问题和政策的再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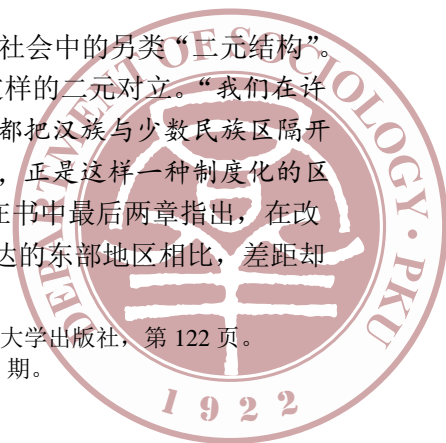
虽然，白荷婷对广西壮族和云南壮族的研究，在理论框架及政策探讨上存在一些问题，但仍不失为美国学界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经典之作，作为一项反思新中国民族政策和理论的经验研究，确实指出了我国政府在制度设计中的一些局限性。

值得我们思考的是。虽然我国处理民族关系的原则是“平等、团结、共同繁荣”，但什么是民族平等？如何通过民族平等而达到共同繁荣？美国学者戈登曾区分出“自由主义的多元主义”和“团体多元主义”，这两类在多种族——族群社会推行“多元主义”的不同类型。其中在“‘自由主义的多元主义’ (liberal pluralism) 的社会里平等主义的规范强调的是机会的平等，对个人的评价也是基于评价其表现的普遍标准。……在‘团体多元主义’ (corporate pluralism) 中，种族和族群通常都背看作具有法律地位的实体，在社会中具有官方的身份。经济和政治的酬赏，无论是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都按照数量定额分配，定额的标准是人口的相对数量或由政治程序规定的其他方式所决定。这类平等主义强调的更多是结果的平等，而不是机会的平等”<sup>1</sup>。也就是说，各族群成员并不是由于他们的族群背景来获得机会，而应该让公平竞争的机会能在更大程度上落实到个人。

除了“民族平等”的定义需要重新思考外，我们还必须正视我国社会中的另类“二元结构”。因为无论在民族研究还是在制度设计上，我们的思路还一直存在着这样的二元对立。“我们在许多制度设计中，在教育体系、科研体系和许多政府部门的实际工作中都把汉族与少数民族区隔开了，使汉族和‘少数民族’成了‘二元结构’中相互区隔的两个部分，正是这样一种制度化的区隔造成了主流人群对我国‘少数民族’的生疏与漠视”<sup>2</sup>。正如作者在书中最后两章指出，在改革开放的 30 年以来，广西的经济和教育在获得发展同时，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相比，差距却

<sup>1</sup> 马戎，2010，西方民族社会学经典读本——种族与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 122 页。

<sup>2</sup> 马戎，2010，“中国社会的另一类‘二元结构’”，《北京大学学报》2010 年第 3 期。



在逐渐地拉大；而且，因为原有的制度设计无法适应现实情况的变化，各族群的精英们也只能在国家政策允许的框架内要求更多的发展机会。

如何避免各族群成员处在发展过程中却又不断增长的挫折感？如何走出白荷婷在书中所提到的，人们抱怨的广西在民族自治制度和优惠政策下“自由地变穷”？也许我们需要转换一种思考和研究的角度，从而突破原有民族制度设计中的局限性。

#### 参考文献：

- [美]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吴叻人译，2005，《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散布》，上海：世纪集团出版社，第6页。
- [美] 斯蒂文·郝瑞，巴莫阿依、曲木铁西译，2000，《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 范可，2011，“‘边疆发展’献疑”，《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 范宏贵、顾有识，1989，《壮族论稿》，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第115-131页。
- 费孝通，1951，“关于广西壮族历史的初步推考”，《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新编》（上卷），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费孝通，1988，《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第170-172页。
- 费孝通，1989，“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 黄光学、施联朱，2005，《中国的民族识别——56个民族的来历》，北京：民族出版社，第65页。
- 李富强，2010，“壮族是创造的吗？——与西方学者 K. Palmer Kaup 等对话”，载《桂海论丛》2010年第2期。
- 马戎，2010，“中国社会的另一类‘二元结构’”，《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 马戎编，2010，《西方民族社会学经典读本——种族与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毛泽东，1939，《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选自《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彭文斌、汤芸、张原，“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人类学界的中国西南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1期。
- 吴薇、王明富，2001，“美国教授看壮族——美国富尔曼大学副教授白荷婷访谈录”，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年12月19日第5版。
- Kaup, Katherine Palmer. 2000, *Creating the Zhuang: Ethnic Politics in China*. Boulder &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 Mullaney, Thomas S. 2011,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Nation: Ethnic Classification in Modern China*,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本期责任编辑：马戎、李健  
邮编：100871  
电子邮件：[marong@pku.edu.cn](mailto:marong@pku.edu.cn)

